

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向近代转型的作用^{*}

高志旺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从总体来说,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首先,基于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带来了近代科学的大发展;其次,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本文拟从这两方面,来论证中世纪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正面关系。

关键词:基督教;西方近代科学;西方近代文化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458(2009)01-0336-02

在中国的西方历史研究中,研究者把从公元476年罗马帝国灭亡到英国革命以前的世纪称为“中古时代”或“中世纪”,此词本身就带有贬义:即认为它是介于近代与古代的一个中间的世纪、一个过渡年代。就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文化发展而言,基督教无疑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巴利托说这是一个“思想低落到使人怜悯的世界”,一切人文学科都变成了“神学的一个卑贱的侍女,即一种精神的反常。”克罗奇说:“他当然不是进步,而是陷入绝境。”^[1]而14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号,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被认为是西方中世纪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分水岭,并开启了近代社会文化的大门。由于文艺复兴成就辉煌,更使研究者在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习惯于否定前者而盛赞后者。其实,要更好地认识西方近代文化,就必须遵循它自身所蕴含的历史规则,准确公允地认识基督教文化,看到它的传承与延伸。事实上,基督教之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儒家伦理之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基督教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传承与革新两方面来加以阐述。

一、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带来了近代科学的大发展

从整个西方文化来看,上帝与理性、宗教与科学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两个基本精神。只有把二者理解为统一的,才能阐释西方文化的个性。

雅斯贝尔斯说:“如果没有源于基督教历史的精神阐述和冲动,现代科学的诞生也许是不可想象的。”^[2]他认为:有三条基督教的精神成为现代科学文化诞生的内在动机,一是“基督教的精神要求不惜代价的真实”。二是“世界是上帝的创造”。三是源于虔敬信仰的无限认识与由认识到的事实带来的对上帝的疑问之间的冲突,连续不断地促使着人们去进一步认识、检验或证明上帝的真实。真实是基督徒去追求的最高峰,源于上帝对真理的追求要

求把认识当作严肃的天职,既然世界是上帝的造物,那么,万事万物都值得去了解。认识就是对上帝思考的再思考。在这方面,恭敬的、如实地阅读上帝的大自然这本书,的确成了许多科学家不懈地探究自然真谛的精神动力,而受造的世间万物任何地方都永远不是最终的绝对的真实,它总是指向别的东西。因此,科学必然是一个无限的追问过程,它由理性涌出又不封闭于其中,于是,形成了理论建设和经验试验之间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由此造成对迄今未知的真实的接近。雅斯贝尔斯认为正是在这种基督教精神的推动下,现代科学才得以形成^[3]。

德国的物理学家厄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曾说过:“每一个不具偏见的头脑都必须承认,科学和技术重大的发展是发生在神学占统治地位的年代。”^[4]我认为把科学的到来归功于基督教文化是基于以下三点:首先,基督教的宗教信仰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信仰至上,信仰与理性(理解)共存。基督教的根本信仰是上帝和创世观念,基督教坚持只有一个上帝——即一位理性的存在,它创造了世界,并独立和区别于世界。大自然作为上帝的作品和创世的见证,它受到珍视但不会受到崇拜。而在原始宗教中,人类的自然观被赋予某种神奇的力量,自然成为被尊崇的对象。人在它面前无能为力,而探索和利用自然,改造和驾驭自然被认为是冒犯和亵渎神灵;人也是上帝创造的,具有上帝的智慧与头脑,代表上帝治理世间万物,因此基督教的根本信仰激发了人类极强的创造欲望。并且人的行动受精神支配,在进行各种活动时都伴随有精神动力。宗教信仰是极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对神产生自觉地、彻底的献身精神,使人类劳动带上了为上帝做贡献的性质,这些无疑会对创造性劳动产生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劳动更有成效。人们因信仰基督教,从而获得强大的精神动力。

其次,基于基督教根本信仰的初始观念改造了人类的自然观。按照基督教教义,上帝是创造和管理天地万物的主,但是上帝又是肉眼凡胎所看不到的,如何来认识和接近上帝?第一通过圣经;第

* 收稿日期:2008-07-02

作者简介:高志旺(1973-),女,河南信阳市罗山县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现代史。

二、通过上帝的造物,即(自然)包括人来认识上帝,因此,“高级宗教的出现,意味着宗教这个包罗万象的认识体系,从此把目光更加集中在人和宇宙的终极存在上,去寻求宇宙的终极答案。”^[5] 基督教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人类自然观的一次大转变,“在现代科学兴起的年代,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上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他们探究自然的方法,即它们的科学。”^[6] 自然观的变革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埋下了文化的种子,正因如此,“在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7]

最后,基督教认为人负有原罪,所以人在尘世的生活是有缺憾的,但通过虔诚的赎罪和神之拯救,能在天国实现圆满。这种学识使得西方人看到,真正的理想在天国世界需要人不断的追求才能得到,必须克服自己的欲望,向更高的灵魂境界飞升。基督教的这种文化思想成就了西方人“人定胜天”的人生文化信条。而这种世界观提高了人在自然界面前的地位,增强了人的力量,为人类探索自然和利用自然提供了神圣的根据,从而使人类能够放心大胆地去发展科学技术。事实上,现代科学的产生深深植根于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之中并受到它的巨大的精神推动,赫伊卡总结道:“倘若我们把科学喻为人体的话,其肉体组成部分是希腊的遗产,而促进其成长的维他命和荷尔蒙则是《圣经》的因素。”^[8]

二、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要准确公正的认识基督教文化,就要看到它的承继性和延伸性。应当指出,“中世纪决不是黑暗的和野蛮的,而是充满着文明的光辉和伟大的思想,它从古代的文化中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9] 众所周知,基督教是犹太教的“私生子”,即它原由犹太教的一个支派“纳撒勒”派发展而来,随着公元313年“米兰敕令”的颁布,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被承认,随即在欧洲各国传播开来。在谈到基督教的起源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谈到它的“父亲”——犹太教的多种文化来源。

早在公元前1600多年前,犹太人的祖先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而迁徙到尼罗河平原,在停留在埃及期间,他们受到埃及一神教——阿蒙神的深刻影响。当公元前586年犹太亡国,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时,两河流域的文化又对他们的宗教观念进行了荡涤。公元538年,波斯帝国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返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重新建立了神权统治集团,但建立伊始即受到波斯帝国严格的控制。当时波斯帝国的国教琐罗亚斯教——其教义中关于主神崇拜和对救世主企盼的文化观念,进入了犹太教的思想体系。公元前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产生时,它接受了犹太教的《圣经》而称之为《旧约》。因此,可以说基督教文化就是从多元性的文化背景中涅槃而生的。在它产生伊始,尤其是当它开始超出犹太教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围,在罗马帝国内寻求“普世性”的发展时,它所面对的对手不仅仅是一个传统的希腊罗马多神教,而且也是一个混杂了各种东方神秘主义信仰的“宗教万花筒”。基督教文化就是在不断地与各种异质文化——希腊罗马的、波斯的、犹太的、埃及的、日耳曼——的对话与竞争中生长出来的。诚如邓晓芒教授在对巴克教授的回文文章中所言:“基督教信仰区别于其它信仰之处就在于它是两千年来在对话中不断生长着的信仰。”^[10] 西方文化的两个源头,即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在各自经过曲折变化的历程后,在罗马帝国相遇,碰撞,融合,形成统一的罗马帝国文

化,与此同时,一种融贯信仰至上和理性至上原则的新的文化代表——基督教文化切入了这一历史场景,并逐渐上升为罗马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造就了罗马帝国文化的转型。由此,西方文化发展的下一阶段就定格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

三、基督教奠定了新的西方文化个性——对人的终极关怀

让我们还从古希腊的原始宗教谈起:以奥林匹斯神话和英雄传说为主要内容的希腊多神教是希腊人信仰的宗教,这种原始宗教具有感性形态,它的基本格调是自然崇拜,自然性和直观性(或感性化)是希腊多神教的主要特点。希腊主神大多是某种自然力量的化身。黑格尔指出:“希腊人的神尚非那绝对的、自由的‘精神’,而是在一种特殊方式里的‘精神’,为人类之各种限制性所拘束的——依然是依赖于外界情形的有定的个性。”^[11] 这种原始的宗教观虽然是人自我认知的一种进步,即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差别,但这一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是要满足人的自然属性,人的本性要求和自然欲望是他们行事的唯一依据和最高准则。而中世纪早期动荡的社会现状是:人民生活无着,无依无靠的恐惧感日增,而“人的依赖感使宗教的基础”,^[12] 这样,基督教迅速占据了人类精神的制高点,基督教关于上帝之信仰代替了原始的自然崇拜,改变了人对自然的绝对服从的状态,使人类建立了全新的世界观,而世界观的改变也使人们将关注的目光由自然投向人。因为“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上帝用爱来创造的,是在上帝心中先有的一个模型的仿制,上帝将永远是它的推动者和恢复者,人能够由于承认上帝而把它纳入自己灵魂的狭窄范围之内,也能够由于热爱上帝而使自己的灵魂扩展到它的无限之中——这就是尘世上的幸福。”^[13] 正是基督教的出现,才把古代的人由自然人的观念发展到了认识“精神的人”,使得西方世界的人在认识自身的时候达到了精神世界的高度。

而且从人的角度看,整部《圣经》都指向人要走向的最高境界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14世纪勃兴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内容,它有两大发现:其一是外部世界(自然和地理)的发现;其二就是主体世界(人)的发现。诚如哈里斯·哈伊所言“我们受到近百年来史学的影响,习惯于认为文艺复兴就是现代文明的诞生。”^[14] 这种认识有意无意地夸大了基督教文化与近代文化的鸿沟。首先,“在人与神的关系上,而人文主义者除少数接近无神论的边缘外,大多并不否认上帝造人这一基本前提。”^[15] 其次,“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的批判大多仅限于指出教会的腐败和虚伪,并未触及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及其赖以存在的根基,人文主义者倡导的文艺复兴运动并不是倒神运动,他们关心的是人与神关系的进一步调整,而不是对上帝的存在与宗教本身价值的怀疑。”^[16] 从文化的视角看,正是基督教文化把人关注的目光由自然而投向人,它和文艺复兴运动都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所以,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开启了近代社会文化的大门,那么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则是大门开启前透进门内的缕缕清辉。在“中世纪与人文主义之间并没有骤然的断裂或容易划分的界限”(布洛克语)。“作为古典主义的人文主义并非突如其来。它是在中世纪思想的纷繁茂盛之中长成的。而中世纪的思想特征和文化模式也或明或暗的运行于后世文化的各个领域。”^[17]

因此,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继承了西方文化的源 (转第340页)

竞争考试的关注继续升温,1870年格莱斯顿又颁布了第二个关于文官制度改革的枢密院命令。法令规定:文官录用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文官制度委员会在财政部监督下,有权独立决定被录用文官的基本条件。为了避开保守势力的压力,又规定外交部和内政部可以例外,某些高级官员的职位仍可不经考试而由内阁直接任命。期间,政府对文官的录用、分级、薪酬、晋升和管理等方面不断修改和补充。但由于英国文官制度重要原则是这两次枢密院命令确立的,所以人们把1870年枢密院命令看作文官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

三、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评价

尽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初期存在:文官晋升、管理不统一的问题;牛津、剑桥两所大学毕业生垄断高级文官职务、门派限制和重文轻理的现象;性别歧视严重,广大妇女不能进入重要岗位,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缺憾。但总的来看,近代文官制度,既是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资产阶级创造的制度文明,对资本主义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文官制度中的一些重大措施,为欧美国家建立文官制度提供了宝贵经验,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形成一个伟大时代的最大的公务革新之一。

第一,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工业资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反对封建残余势力和资产阶级保守势力的一次巨大胜利,剥夺了封建保守势力的对行政机构的控制,是对封建专制、独裁官员管理制度的否定。巩固和扩展了19世纪中期两次议会改革的成果,加强了资产阶级在政府行政机构的地位,有助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

其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避免了“恩赐官职制”和“政党分肥制”造成的腐败、低效、混乱状况,排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任人唯亲对国家政策的干扰,保证了政局稳定性、政策连续性和社会常态运行。

第二,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

(1)通才原则:高级文官的考试内容以基础理论、人文科学为主。要求有较高文化修养、渊博知识和应变能力的通才。此举杜绝了不学无术之徒混入官场,使文官队伍素质大为提高。

(2)公平竞争原则:1870年枢密院命令规定:“凡未经考试未持有合格证书者一律不利从事任何官职。此后所有选拔官吏必须经竞争考试,从中择优录取。择优录用、用人唯贤、机会均等是公平竞争原则的体现。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首相帕麦斯顿荐举一个亲信参加文官考试,结果落选。帕麦斯顿派人到文官委员会去索取该生的考卷,以便了解是怎么落选的,遭到了拒绝^[4]。

(3)常任中立原则:文官职责是执行政府的政策。他们是“非政治分子”,不参加党派斗争,不参加政党政治活动,不得竞选议员,保持政治中立。在内阁时常更迭的情况下,他们不与内阁共进退,“无过错不被免职”。还经常受大臣们的咨询,向其提供情报、知识、经验。这些职能的行使,使文官成为统治阶级“从不更迭的幕后政府”,文官的常任,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英国建立的这一套制度使文官的任用、选拔、晋升、管理等进入民主化、制度化,政府机构充满生机活力,官僚主义作风减少,维护了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舆论界称赞改革“消除了所有笨伯,总的说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能力、很有声誉的班子,同时,一个全新的节约和勤奋精神得到了贯彻。”^[5]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领先于世界,文官制度改革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英国近代文官制度成为西方各国纷纷效仿的对象。邓小平曾经给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文官制度很高的评价。“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此我们可以像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借鉴我国的科举制一样,从他们制度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改变我们人事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董祥瑞. 英国行政机构和文官制度[M]. 天津出版社, 1989. 63.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 487.
- [3] 刘翠英. 论近代英国的文官制度[J]. 韶关大学学报, 1998(8).
- [4] 王 铭. 英国文官制度述论[J]. 辽宁大学学报, 2007(8).
- [5] 姚景芳. 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J]. 辽宁师专学报, 1999(5).
- [6] 钱乘旦.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225.
- [7] 黄守勇. 论西方的文官制度[J]. 岳阳大学学报, 1989(2).
- [8] [英]阿诺德·汤因比. 人类与大地母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528-529.
- [9] [10] 李柏槐. 中国古代文官制与英国文官制之比较[J]. 四川大学学报, 1995(2).
- [11] 杨 云, 刘书林. 近代世界重大问题探讨[J].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3(5): 99.
- [12] 道格拉斯. 英国历史文件(第十二卷第一分册)(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M]. 伦敦: 1956. 574.
- [13] 阎照祥. 英国政治制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 359.
- [14] 埃顿. 英国文官制度(D. B. Eaton, Civil Service in Great Britain)[M]. 纽约: 1880. 209.
- [15] 寇因. 英国文官制度发展史(1780~1939)(E. W. Cohen,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Civil Service)[M]. 伦敦: 1941. 121.

(接第337页)

头——两希文明博大的文化内涵,同时又以自身独特的宗教信仰和理性改变了西方人的思维习惯和看待世事的态度,在西方文化向近代转型过程中起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克罗齐. 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159.
- [2] 卡尔·雅斯贝尔斯.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 106.
- [3] 田 薇. 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M].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0. 208.
- [4] Ernst Mach, Science of Mechanics, trans, Thomas. J. McCormack [M]. La Salle, 11. :Open Court, 1960. 549.
- [5] 程世平. 文化之源——论广泛意义的宗教[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59.

- [6] [8] R. 赫伊卡. 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3. 167.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254.
- [9] 加林. 意大利人文主义[M]. 李玉成,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98. 12.
- [10] 晓 芒. 真理:在哲学与神学之间[M]. 维真学刊, 2000(3): 21.
- [11]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387.
- [12]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6. 436 Y
- [13] 布克哈特.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 何 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543.
- [14] 丹尼斯·哈伊.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M]. 李玉成,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88. 134.
- [15] 林 涛. 浅析文艺复兴对宗教改革的影响[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2).
- [16] 孙继静. 文艺复兴的信仰与理性[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 [17] 程志敏. 论人文主义的历史向度[J]. 人文杂志, 1999(5).